

敬畏民意：发自内心，更要付诸行动

《敬畏民意》这本书，集中关注中国目前的民主治理和政治改革问题。

我特别注意区分两种学问，一种是天国的学问，一种是尘世的学问。天国的学问是纯学问，就像登山，谁爬得快就登得高，即便成千上万的人成群结队与他竞争，还是赶超不了。而尘世的学问，一个人不行，需要集体的力量。因为解决这些问题既需要基本的共识，更需要大家的共同合作和努力。尘世的学问，即现实的学问，需要相互切磋，需要集思广益。

《敬畏民意》正是后一种学问，是现实的学问，是现实关怀的产物。我希望，我书中的观点，能与更多的人所分享，大家一起构建改革共识，凝聚理性，一点一滴地推动社会政治的进步。政治的进步，是最深刻的社会进步，因为它将人类文明的成果用制度的形式固定下来。——俞可平



俞可平 1959年生，浙江诸暨人，教授，哲学与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，中央编译局副局长。著作有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、《敬畏民意》等。



《敬畏民意》
作者：俞可平
版本：中央编译出版社
2012年3月
定价：45.00元

C03-C05版采写
新京报记者 朱桂英

相信中国，相信民主是个好东西

【书摘】

民主作为一种普遍的人类价值，主要不是发展的手段，而是发展的目标。以人的自由、平等、尊严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本身就是一种基本价值，正像福利是一种基本价值一样。

——《全球化与“中国模式”》P53

新京报：在影响广泛的《民主是个好东西》以后，你又相继发表了《让民主造福中国》和《思想解放与政治进步》等关注“尘世学问”的著作，现在又出版了《敬畏民意》，孜孜不倦地致力于推进中国的民主政治。但仍然有一些学者提出截然不同的观点，例如，有人主张中国“要法治”而不要民主；有人建议，“要自由”而不要民主；有人认为，“不能简单说，民主是个好东西”；有人用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民主的“乱”，新加坡威权制度的“好”，以及中东的最新例子，来论证民主不是个好东西。你怎么看待这些观点？

俞可平：这毫不奇怪，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反对民主的人。有些人是故意的，有些人是盲从的；有些人是直接的，但更多是间接的。我最不想看到的是，那些并没有真正清楚民主的意义、同时自己的民主权利也远没有充分实现的人，也跟着一些人反对和质疑民主，这有点像俗话说说的“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”。

其实，我从来没说过民主是十全十美的和无所不能的，我只是说在人类迄今发明的政治制度中，相对来说民主是最好的一

种。同时，我始终认为，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，不可分离。在我看来，说“要自由而不要民主”，就像说“要自由贸易而不要市场经济”一样不得要领。

有些人批评说，不能简单地说“民主是个好东西”，只能说“好民主才是好东西”。这正如讲，你不能说“人是要吃饭的”，而只能说“正常的人是要吃饭的”一样。因为人在不正常状态下，可能不要吃饭，例如急救中的重病人。按照这种逻辑，我们都不能正常说话了。

一种制度的好坏，归根结底只有本国人民才有发言权。我

倡导的是“增量民主”，即发展民主的着眼点是不断增加人民群众现实的政治权益。如果民主的结果是法治破坏，社会动荡，那就只会损害人民的政治权益。这样的“民主”，从来不是我倡导的民主。决不能简单地拿其他国家的情况来与中国进行类比。

我们不仅要有对民主的信心，也要有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信心。正如当年毛主席所说，“我们要相信党，相信群众”，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找到一条合适的民主发展道路，不断增大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权益。

通畅民意渠道，拓展表达空间

【书摘】

我深信，会有更多的民众珍惜权利，会有更多的学者怀抱理想，会有更多的官员敬畏民意。民意所向，即如潮流所趋。“青山遮不住，毕竟东流去”，信然！

如果大多数公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的保护，人民就有权收回委托给执政者的权力。能否从制度上保证民意的向背成为执政者权力去留的决定性因素。

——《敬畏民意》P3-P5

新京报：可不可以这样理解，敬畏民意，首先须洞观时局，默验舆情，即知“民意”，知而后敬，知而后畏？

俞可平：敬畏民意，当然不能只停留于口号。如果那样，就谈不上“敬畏民意”，而是“糊弄民意”。敬畏是发自内心的，而且要付诸行动。确实如你说，敬畏民意首先就要了解民意。不知民意，连“为民做主”都做不到，更何谈“人民当家作主”？要了解民意，首先需要让民意能够得以充分表达。

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，基本处于铁板一块的状态，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等高度一体化，利益单一化，声音也只有一个。改革开放这么多年，社会已经发

生结构性分化，原先的单一性社会已经转变为多样性社会。不同的利益群体已经形成，而不同的利益群体，必然有不同的需求。虽然党和政府一直在拓展民意表达渠道，但远远跟不上民意多样性表达的现实需要。让不同的声音表达出来，疏通并扩大民意表达渠道，对于推进中国的政治进步尤其重要。

新京报：但当下中国，民意的表达空间以及表达途径，并非全然自由通畅，如何才能使“敬畏民意”不停留于口号与呐喊？

俞可平：制度性的民意表达受阻，已使中国出现了一些不正常的社会现象。比如，中国的网民，是一个特殊的群体。国外的网民，通常的议题是谈情说爱，

风花雪月，吃喝玩乐，中国的网民则高度关注政治。这么多网民在虚拟空间中谈论政治，是因为现实社会中缺乏制度性的参与渠道。因为没有足够的制度化渠道来表达其观点，所以网络变成了政治言论的表达阵地。

你看，这些年中影响广泛的政治事件，多半是在网上产生的。网民参政议政，成为中国公民社会的重要特色。此外，令各级政府十分头疼的民众上访，数量和规模也一直居高不下，群体性上访事件层出不穷，主要原因也是制度性利益表达受阻。只要百姓有冤无处诉，有求无处应，即使你不让他“游行”，他也可能上街“散步”；你不让他“示威”，他也可能到机关去“喝

茶”。如果民意是通过“非正常的”渠道和形式得以表达的，那难免这些表达的“非理性”。

利益多元化，诉求多元化，而没有相应的表达渠道，那么，民意被阻滞、被扭曲，直至“被代表”，都在所难免。解决这一问题，需要制度性改革，这是一个比较紧迫的任务。已有的制度性利益表达渠道，须与时俱进，加以改善；更重要的是增加新的渠道，拓展言论表达的空间。特别是要营造一个良好的宏观制度环境，让各个利益群体都有通畅的渠道，最大限度地自由表达其意见和诉求。从本质上说，民意表达不仅事关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，更事关公民的言论自由权利。

(下转 C04 版)